



从“遵命文学”到“听命文学”的流变 ——比较分析以上两种文学对作家的影响与农民题材小说的叙述方式 **The Evolution from "Follow Order Literature" to "Obedient Literature":**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he above two kinds of literature on
writers and the narrative styles of peasant novels*

趙平

ZHAO PING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学院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E-mail: zhaoping1880@gmail.com

Received: 27 September 2020 / Revised: 23 Octoberber 2020 / Accepted: 22 October 2021

摘要

在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农民题材的话语模式和叙述方式，在中国不同的历史年代和社会变革时期有着自己的文学特点。从“遵命文学”到“听命文学”的流变，反映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和政治生态环境下，作家的思想意识和创作方法。遵命文学与听命文学下的作品显示出不同的话语模式和叙述方式，反映着当时一定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思想，并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作者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主流社会文化思想的影响。论文阐释了“遵命文学”与“听命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比较分析了两者之间不同的特点和文学创作意识，以及政治对文学的影响。论文认为这两种文学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思想意识和不同政治生态下的不同创作方法和对作者的不同影响。

关键词：遵命文学；听命文学；农民题材；叙述话语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discourse mode and narrative style of peasant themes have their own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years and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The evolution from "follow orders literature" to "obedient literature" reflects the writer's ideology and creative methods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politi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The works under obedience literature and obedience literature show different discourse patterns and narrative methods, reflecting certain social changes and cultural thoughts at that time, and to varying degrees are influenced by the mainstream social and cultural thoughts of the era in which the author lived. The thesis points out that these two kinds of literature reflect different creative methods and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 author under different eras, different ideologies and different political ecology.

Keywords: obeyed literature, obeyed literature, peasant theme, narrative discourse



引言

在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农民题材的话语模式和叙述方式，在中国不同的历史年代和社会变革时期都有自己的文学特点。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不少农民题材的作品，反映出作者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特征。他们作品中不同的话语模式和叙述方式，代表着当时一定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思想，并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作者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主流社会文化思想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分析20世纪初鲁迅的“遵命文学”和20世纪40—70年代的“听命文学”，以及鲁迅与赵树理、柳青和浩然的思想意识，来探讨他们在农民题材小说叙述方式上的不同特点。当我们对不同时期反映中国农民题材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写作的对象虽然都是中国农民，但他们所关注的重点却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另外，这些作品的语言风格和读者群也是不同的。他们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作者不同的文学使命，他们的叙述特点可以从他们各自所遵循的“遵命文学”和“听命文学”中反映出来。

一、历史使命下的遵命文学

鲁迅在1932年的《南腔北调集》《自选集》的自序中说，他1918年开始写小说“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当时胡适和陈独秀等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于是鲁迅在朋友的劝邀下，提笔撰文，“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后来出了第一部小说集《呐喊》。鲁迅说：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①

鲁迅在谈到他的小说集《呐喊》的意思时说，由于受到新文化运动的鼓舞

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②

鲁迅把他这时期的作品称为“遵命文学”，是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响应他们的号令，用文学革命之笔，书革命文学之文，向反动腐朽的封建专制和思想文化冲击。鲁迅把“遵命文学”的笔锋首先指向了中国最广阔的农村大地，以农民题材为先导开创了中国20世纪的乡土文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中，鲁迅有不少作品是反映农民题材的，如《阿Q正传》、《药》、《风波》和《故乡》等。虽然这些作品是写中国农民，但它们主要的读者群还是知识阶层。鲁迅写农民题材的作品为的是给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看，让文化知识界多关注农民问题，通过对农民命运的描写，让人们看到农民的遭遇，揭示这个群体在精神上的病态，性格上的软弱，思想上的落后，认知上的短浅和文化上的闭塞等现象，挖掘农民在政治上被封建制度奴

^① 鲁迅：《鲁迅选集》第5卷，《〈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北京第1版
第23—24页，第23页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呐喊·自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北京第1版，第6页，第4页



役，在精神上被封建礼教和传统文化束缚的社会历史原因，从而进一步引出探讨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并对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进行揭露和批判。

鲁迅所说的“遵命文学”产生于中国社会不断变革的时期。帝制被国民革命推翻，中国新文化运动正在发展，同时中国文学的演变在语言上也正处于从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变时期，同时也带动了诗歌和小说叙述方式和语言运用上的文学革命。这些都为中国小说叙述手法的创新开辟了新的天地和发展的空间。胡适、陈独秀等以新文化倡导者的身份发出了文学革命的呼唤，鲁迅积极响应了这场文学革命，并担当了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实践者。在鲁迅以白话文写作的一系列反映农民题材的小说中，我们看到鲁迅在小说中的叙述语言已随着白话文运用的不断成熟，而且通过吸取一些外来的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小说在叙述手法和语言表达方面向中西融合和大众化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鲁迅的“遵命文学”所反映的农民题材的作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在思想文化方面

鲁迅受到中国新文化运动和外来文化思想的影响，在中国社会的变革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世界观，以自觉的态度和坚定的独立人格在思考和洞察中国社会，通过对对中国农民命运的关注，对造成农民精神上病弱的社会原因的揭示，来改造中国国民性，并尊奉那时革命前驱的命令，用文学革命的力量去唤醒民众，改变生活在封建、半封建社会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精神面貌。在这里鲁迅并没有对一种新思想或新口号盲目和被动的跟从，更没有把遵命于前驱者的“命令”当成“皇上的圣旨”来执行，而是积自己在生活中所经历的各种经验，通过比较和独立思考，自愿地去做着荡涤社会污垢，开创新的历史的文学工作。所以在鲁迅创作的小说中我们没有看到他成为某种思想的傀儡，也没有被新文化运动中主将们的一些话语所束缚，而是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和独立思考者，为中国劳苦大众而助威呐喊。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集中反映了鲁迅以笔为武器，用小说的形式唤起民众反封建的意识，改变国民中存在的劣根性。面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和人们的思想状况，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为达到鼓舞国民反对封建社会的目的，鲁迅激励国民不畏强权勇敢地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反抗封建礼教，争取民族的解放。

2. 在叙述方法和语言方面

鲁迅在有关农民题材小说中的叙述方法不拘一格。鲁迅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注入了改造国民性的理念，而且在中国小说的叙述语言方面也融入和借鉴了西方文学的多种表现手法，使白话文小说在创新的道路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鲁迅在小说创作中突破了以往的叙事模式，注重小说中不同人物的语言特点和身份。如狂人的“狂言乱语”，阿庆嫂的“唠唠叨叨”，孔乙己的“之乎者也”，阿Q的“现在的世界太不成活，儿子打老子”等，都形象地反映了小说中人物的特征和心理状态。

鲁迅的叙述风格和语言特色突出地表现在由于文学革命的推动打破了传统章回小说的模式，在雅文学向俗文学的演变中，以白话文的通俗，大众化的语言，以及吸收外来的描写手法，搭建了白话文小说发展的平台。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用直白通俗的语



言，深刻揭露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化吃人的本质。这一平台的建立使中国小说的读者群和阅读审美逐渐地发生着变化。这也预示着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的小说从写农民，主要给知识群体看，为中国20世纪40—50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农民题材的小说从写农民，主要给农民看的转变做了铺垫。

3. 在对农民命运的关注方面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到：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①

这段话可以被看作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为改造中国的国民性选择从最广大的区域中国农村落笔，从人数最多的中国群体农民着眼，在思想上以“遵命文学”为先导，在文化上以乡土文学为先锋，实现其改造中国国民性的目的。于是在鲁迅一系列的以农村题材为主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生动的人物生活在中国20世纪初，有着不同身世的农民形象。他们是从不争的阿Q到迂腐的孔乙己，从悲惨的祥林嫂到麻木的闰土，从认为“一代不如一代”的七斤嫂到愚弱的华老栓……。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无不反映出在“遵命文学”的使命下，鲁迅从中国农民这一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下笔，把改变中国国民的精神和批判其劣根性与创作农民题材小说结合起来，在小说中体现出自己的思想抱负和深切的人文关怀。

在“遵命文学”中，鲁迅的乡土文学所反映出的中国农村的场景和农民的精神面貌，是鲁迅根据中国的现实和自己的深刻观察所创作出来的。在创作过程中没有什么政治的框架和固定的文学模式来指导和规范着鲁迅。反而由于鲁迅在文化思想上自愿接受了新文化运动前驱文学革命的主张和“命令”，而在政治思想上拒绝“圣旨”式的听命，使鲁迅能在人格上独立，在思想上自主，在创作上自由。

鲁迅在《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中说：

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②

鲁迅这种只遵命而不受命的文学观，让鲁迅的创作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模式，在语言上大胆运用白话文，在叙述上把中国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描写手法相融合，开创了中国小说新的叙述形式和话语，以农村题材的小说为先导，在小说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方面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概括鲁迅的“遵命文学”的内涵，是为了进一步探讨和比较分析鲁迅的“遵命文学”与随着中国社会的演变和抗日战争的爆发，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上所出现的“听命文学”，以及“听命文学”时期在农民题材小说上的代表作家，以及他们的话语模式和叙述方式。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呐喊·自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北京第1版，第6页，第4页

^② 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第3卷，第418页



二、政治主导下的听命文学

在20世纪40—50年代，农民题材的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发生着变化。这一变化的原因与当时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革是分不开的。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地区的文化宣传运动，把农民作为文化宣传的主要对象，在农村开展着反对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和封建势力的斗争。

在当时文化思想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文艺界开展了整风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制定了发展的方向和准则。赵树理在这场社会变革和文化宣传中，自觉地遵循和听命于中国共产党所制定和提倡的革命文学的“指令”，他的文学创作以写农民题材为主，帮助和鼓舞农民在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中解放思想，为自身利益而勇敢抗争。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自愿尊奉着革命前驱的命令，努力实践着文学革命的目标，并把他那个时期的作品自命为“遵命文学”。在这里我们不妨把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听命文学”，即他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和革命实践中，自愿听命于和遵循着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路线，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去创作，被认为是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有成效的一位作家。

20世纪40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叙述方式，以及文学语言都与鲁迅的农民题材的小说特点有所不同。把赵树理笔下反映农民题材的作品与鲁迅有关农民题材的小说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的变革，对农民问题的关注点已经发生了改变。

鲁迅的小说对农民的关注主要是在文化思想和精神方面，而赵树理的小说对农民的关注已不仅在精神上，而且也涉及到农民具体的物质利益方面，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给农民带来的成果，并把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斗争从单纯的精神方面转向了与封建势力和剥削阶级进行斗争的具体结合上。

从赵树理的三部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到反映中国农民题材小说的具体内容，关注的焦点，叙述的语言特点和读者群都与鲁迅时期的农民题材的小说有所不同。

比如《小二黑结婚》反映的是在新政权废除旧的婚姻制度，提倡自由恋爱的环境下，进步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反封建斗争。婚姻制度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就完全保障了农民婚姻的自由，因为封建思想和封建势力并不会马上随着封建制度的改变而消失。鲁迅笔下祥林嫂的悲惨命运是封建制度直接统治下封建礼教所造成的，而小二黑结婚中所遇到的各种阻力则是来自破除了封建的包办婚姻制度后，仍然存在的封建礼教思想的干扰。

如果说鲁迅写中国农民的题材为的是达到改造中国国民性的目的，主要是在应用“批判的武器”的话，那么赵树理的农民题材的小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革除旧的婚姻制度的变革，对农村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武器的批判”后的基础上，在新的农村体制下再一次应用“批判的武器”继续揭露和批判封建礼教思想和封建势力，在续写着鲁迅所没能书写的非阿Q式的中国农村的真正革命，以及革命后获得土地的农民的生活和斗争。



与鲁迅在经过了文学革命所描写农民题材的小说相比，赵树理的小说已明显地带有了革命文学的色彩。从鲁迅的“遵命文学”向赵树里的“听命文学”转变的一个明显特点是：

鲁迅时期带有强烈启蒙性的揭示国民中劣根性的农民题材小说，已向赵树理时期带有强烈政治性的农民题材小说的方向演变。在这个演变中赵树理的小说反映了农民的思想解放和革命斗争，以及具体地描写了农村在政治经济上的变革和农民的思想变化。

从赵树理的创作体会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赵树理在《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中谈到：

《李有才板话》，是配合减租斗争的，阶级阵营尚分明，正面主角尚有。不过在描写中不像被主角所讽刺的那些反面人物具体。《李家庄的变迁》，是揭露旧社会地主集团对贫下中农种种剥削压迫的，是为了动员人民参加上党战役的（这一任务没有赶上），其中显然也写到党的领导，……^①

在农民题材的叙述方式和文学语言方面，赵树理与鲁迅另一个不同点是赵树理的小说主要是为农民写，写给农民看的农民题材的小说，而鲁迅则是为唤醒民众写，写农民为给知识界人士看的农民题材的小说，两者自然在叙述方法和语言特色上就有着很大的不同了。

我们知道鲁迅在小说中应用了不少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意识流和象征主义等，并注重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虽然鲁迅的小说在白话文的使用和大众化叙述方面都比中国传统的古典小说利于多数市民阶层读者的阅读，但对没有什么文化的广大农民来说很难阅读的。能被他们接受、阅读和感到贴近的话语，还是赵树理的小说中使用了通俗易懂和口语化的文学语言，书写了反映农民身边发生的故事。赵树理在文学创作中“摈弃了群众口语中庸俗低级和不规范的成分。又以农民群众直接的感觉、判断为依据，选取口语中活的最有表现力的说法”。^②

反映农民题材的小说在政治上和叙述语言上的转变必然也带来读者群的改变。如果说鲁迅反映农民题材小说的读者群主要是生活在城镇的知识分子当中，那么赵树理的读者群不少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了。正因为赵树理在反映农民题材的小说方面从写作心态、内容、语言和思想感情上都特别贴近农民，所以赵树理也被人们称为农民作家。

赵树理时期出现的“听命文学”还反映出其形成的政治背景和思想意识。有“听命”就有“授命”，而发布以“政治第一”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之命的，就是当时领导中国农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人物，以及有解释这一“指令”权的具有一定权威的文学领域的领导者。赵树理的作品之所以主要受到当时中国晋冀鲁豫边区读者的普遍欢迎，除了读者群中有不少农民和其他阶层的读者外，还有与中国共产党中具有一定领导地位的“权威性读者”。当地读者对赵树理小说的接受与喜爱，与这些领导人物对赵树理作品的肯定和高度评价分不开的。他们的肯定排除了一些人对赵树理农民风格小说的偏见。如当时的彭德怀、郭沫若、茅盾、周扬、李大章和冯牧等人，“都给赵树理以很高的评价，一致认为，他是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极有成就的一位作家。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副理事长陈荒煤，就赵树理创作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会后以《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为题，在《人民日报》发表”，^③并把赵树理以主要反映中国农民题材的文学创作称为“赵树理方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思想在中国当代文化领域已具有指导中国文艺创作的绝对权威地位。赵树理时期的“听命文学”所反映的以毛泽东的《讲

① 赵树理：《赵树理文集》（1-4 卷）作者：山西大学合编，工人出版社 198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827 页

② 董大中：《赵树理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53 页，

第 172 页

③ 董大中：《赵树理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53 页，第 172 页



话》精神为指导的文艺创作方向，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从中国的局部地区变成了在整个共和国的大地上普遍加以遵循和执行的了。

随着时代的变迁，作为共和国时期农民题材小说的另一个代表柳青所创作的《创业史》，继20世纪40年代崛起的赵树理后，在创作思想，叙述方式和文学语言上与赵树理时期又有不同的特点。这一特点体现在随着中国农村土地革命后，又一次开展了翻天覆地的农村改革，即中国农民从获得土地后的单干向组织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方向发展，走上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这一变革为20世纪50年代反映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农民题材的小说作家，在创作乡土文学作品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和大量的素材。

柳青的《创业史》就是这样一部反映中国农民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长篇小说。小说以宏大的结构和细致的描写，讲述了梁家父子从1929年继承祖辈遗愿创立家业未能成功，到1949年解放后得到了土地又重燃创业之火的复杂曲折的故事。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创业史，把中国农民从没有土地到获得土地，从单干到组织互助组，以及成立合作社等一系列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思想斗争和人生磨难的经历，用历史和现实的生动画面展现了出来。柳青在谈到他的《创业史》时反映了这一时期“听命文学”的指导思想，他说：

《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小说选择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一次成功的革命，而不是以任何错误思想指导的一次失败的革命。^①

柳青的《创业史》按计划要写四部。从互助组阶段，写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再写到合作化运动高潮，最后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直到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但由于历史和身体健康的原因，他只完成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上部和下部的大部分。然而，继柳青之后，浩然作为中国农民题材小说的另一个代表性的作家，他的成名小说《艳阳天》用不同的故事情节，描写了中国50—6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变革的历史画面。可以说他的作品在一定意义上从另一个侧面完成了柳青对中国农民在这一历史时期从互助组发展到人民公社的宏大的文学叙述。把赵树理、柳青和浩然的农民题材的作品按时间顺序大致排列来看，他们创作的中国农民题材的文学作品较完整地为读者展现了中国农村土地革命后，农民从耕者有其田的个体经营，到逐步组织起来，然后走上了集体化道路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教训。

无论从反映中国农村的广度上，还是从农村变革的规模和时间上来看，如果说鲁迅20世纪初有关农民题材的小说为中国乡土文学拉开了序幕和开场篇的话，那么赵树理、柳青和浩然等中国作家创作的有关农民题材的小说就为中国乡土文学这部大剧的展开，分别在40年代、50年代和60—70年代的剧情变化上搭起了一个具有一定标志性的乡土文学的舞台，并展现和勾画出了农村中不同历史阶段的变革，各种思想倾向的矛盾斗争，以及不同的人物形象。

^① 蒙万夫：《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05月第1版，第95页，第81页，第95页



值得关注的是“遵命文学”和“听命文学”对作者文学创作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与鲁迅的新文化运动式的乡土文学不同，赵树理的延安式的乡土文学与柳青和浩然的共和国式的乡土文学一样，所反映的中国农民题材的小说，从作者的创作思想到小说的内容情节，从叙述方式到文学语言，都是在遵照统一的政治理念和文艺路线来进行。是否听命于这种一体化的文学“指令”来创作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已成为了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生命能否继续进行的一个必要条件。大体上来说，赵树理、柳青和浩然所反映的中国农民题材的作品，把中国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年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农民题材小说的政治倾向，创作道路，叙述方式和语言特点都基本上体现了出来。浩然在谈到他的写作道路时说：

早在1952年我在省校学习的时候，第一次看到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此时既然把搞文学当成终身事业，因而更认真地研读这部著作——它一直是指路明灯！^①

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作家不得不听命当时的政治号令，否则是很难从事文学创作。浩然讲述在文革中的体验时说：

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跟着风浪颠簸，所以这一段的历史脚步
是复杂、险峻的，而且表面上丰富多彩，内含着各种滋味，非是几页稿纸所能说清道明的。^②

浩然的经历反映出他们那个时代的作家，除了在政治上听命于时代的“将令”外，而且在作品的叙述和语言表达上也遵循着当时“指令”的要求，力求文学作品的大众化和革命化。从赵树理、柳青到浩然，他们的叙述方式和语言的运用都尽量做到文学口语化，贴近农民的语言。赵树理的作品不少是短篇，在语言上特别注意照顾农民的接受程度，所以在文学叙说上比较喜欢采取说唱的形式，这样即使看不了几个字的农民也可以听得懂作品的内容。但在柳青和浩然的作品中大都是书面语言，以长篇小说为主，不像赵树理的作品非常口语化，以短篇小说为主。

赵树理讲到他的作品《三里湾》写作前后的体会时说：“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得多一些”。^③ 柳青在谈他的《创业史》时说：“我想使作者叙述的文学语言和人物内心独白的群众语言，尽可能地接近和协调，但我的工夫还不够。^④ 浩然的话语似乎更可以概括他们这一代乡土文学作家的心声。浩然说：“‘写农民，给农民写’。这是我自觉自愿挑起的一副担子”，^⑤ “我是农民的子孙，农村大地生养了我。哺育了我，我决心跟农民和基层干部密切结合：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争取当他们合格的知心人和代言人^⑥。”

^① 孙达佑 梁春水编 《浩然研究专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18页

^② 浩然：《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华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77页

^③ 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引自《文艺报》1955年第13期，24期

^④ 蒙万夫：《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05月第1版，第95页，第81页，第95页

^⑤ 孙达佑 梁春水编 《浩然研究专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26页，第24页

^⑥ 孙达佑 梁春水编 《浩然研究专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26页，第24页



三、两种文学下的不同话语

通过对“遵命文学”与“听命文学”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和区别。不管是遵命还是听命，对鲁迅和赵、柳、浩来说尽管这个“命”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可尊听这个“命”都是他们的自愿、责任和使命，都是为了他们所认定的理念，为农民呐喊，为中国国民发声，使农民能够从精神和物质上得到解放，在文化上得到教益和知识。

所不同的是，“遵命文学”在鲁迅的乡土文学中体现出一种自主创作的理念。这使得鲁迅能够在文学领域中独立创作，不受固定的政治模式所要求的文学叙述的限制。这种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也表现了鲁迅的独立人格。他既反对封建专制，也拒绝那种皇权下的“奉旨”行事。鲁迅之所以愿意遵奉那时革命前驱者的命令，而努力去做新文化运动坚定的实践者，是因为他认为文学革命从思想到语言，从文化到精神不仅能给中国文学带来变革和希望，而且也能通过文学来唤醒当时昏睡和萎靡的国民。于是就有了加入文学革命之中“也来喊几声助威”的行动。“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①

在疗治旧社会的病根中，鲁迅首先对农民这个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下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鲁迅自己的思想意识，鲁迅不可能用阶级斗争的理念来认识和脸谱化地塑造农民形象，而是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为背景，用文学形式真实地反映了在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下中国农民不争与保守，蒙昧与麻木的思想意识，以及他们长期在封闭的社会里挣扎的精神状态。在当时的社会中，鲁迅的“遵命文学”所塑造的人物，多是精神、思想和文化上病弱和蒙昧的典型的农民形象。而随着历史的演变和农村的变革，在赵、柳、浩的“听命文学”中，他们笔下的农民主人公大都思想进步，具有反抗精神，并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是中国革命中农民的典型形象。

从这两种文学所创作的中国农民题材的小说中，读者可以从他们的乡土文学中看到两种主要不同类型的农民形象。一边是阿Q、华老栓、闰土一类弱势分散的个体农民；一边是小二黑、梁生宝、萧长春一类具有斗争精神的组织起来的新农民；一边是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农民形象，一边是生活在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农村改革中的农民形象。在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农民刻画中，前者在鲁迅的笔下主人公的遭遇和命运多是以悲剧结尾，而后者在赵、柳、浩的描写中主人公多是通过斗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们群众的力量，取得了一个个胜利，以一个光明前途为结尾。不同的时代，叙述出不同的话语，因而也产生出不同的文学作品和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鲁迅作品中的农民大都处于一种被封建制度和礼教所压抑束缚的精神病态的生活中。而赵、柳、浩作品中的人物基本上是生活在不断的政治斗争和农村建设改革的发展模式中。

在反映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方面，鲁迅完全自主地驾驭其精神和思想的文学之笔在从事着创作。而赵、柳、浩的文学创作需要听命于总的政治号令。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基本上也像作者一样，也在遵循着统一的指令而生活和奋斗。这种听命哲学的叙述在柳青和浩然的代表作《创业史》和《艳阳天》中都充分地反映了出来。比如柳青在谈到他的《创业史》中主人公梁生宝时说他

^① 鲁迅：《鲁迅选集》第5卷，《〈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北京第1版，第23—24页，第23页



是一个由于新旧社会不同的切身感受到党的无比伟大，服服帖帖想听党的话，努力捉摸党的教导，处处想按党的指示办事的朴实农民出身的年轻党员。^①

其实这种“服服帖帖”，“努力捉摸”和“处处想按党的指示”创作文学作品，又何尝不是赵树理、柳青和浩然所遵循的呢？然而，虽然指导赵、柳、浩文学创作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对农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具体认识，并把这些问题反映在作品中的手法和叙述方式却是不同的。赵树理比较注重农民自身解放和思想转变中的问题，善于发现和指出“听命”中农村出现的具体问题，如他的小说《锻炼锻炼》和《三里湾》。按赵树理的话说就是

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②

如果把赵树理的话语看成是倾向于对农村题材的“微观叙述”的“问题小说”的话，那么柳青和浩然的话语就比较倾向于对农村题材的“宏观叙述”，可以看作是“道路小说”了，即反映农村社会主义发展什么样的道路。因此赵树理的作品多是反映农村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而在柳青和浩然的代表作品中，他们所反映的主要是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农村发展的大方向，由此来叙述农民从单干走向集体化的道路所遇到的各种矛盾和斗争。用柳青的话来说就是“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这一条农村变革的发展道路。赵树理、柳青和浩然创作的中国农民题材的小说，使中国乡土文学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导下，按照一定的政治框架而展开了一系列的话语叙述。从赵、柳、浩在农民题材小说中话语叙述的内容来看，赵树理的叙述偏重于农村中的“人民内部矛盾”，浩然的叙述似乎偏重于“敌我矛盾”，而柳青的叙述则介乎于两者之间。尽管在文学作品的大众化和通俗化方面赵、柳、浩要比鲁迅更贴近农民和读者，但从话语的政治视角来看，他们的创作是在一个总体的框架中进行，文学须无条件服从于政治，使他们的创作不能像鲁迅那样在思想上自由地发挥。他们的创作被要求赋予正面、歌颂和光明色彩，而不是在负面、暴露和灰暗的方面多加笔墨。

在听命文学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对作家来说，谁的作品更紧贴政治形势，更顺着“将令”走，谁似乎才能更保险和少争议地延续他的政治生命而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的权利。而在鲁迅的文化视角中则不存在所谓的创作禁区，政治意识的干预也不能束缚鲁迅在文学的天地里自由创作和独立思考。这也许是“遵命文学”与“听命文学”一个显著的区别。另外，与鲁迅的“遵命文学”不同的是，在“听命文学”那里，赵、柳、浩所创作的农民题材的小说始终是在革命政治的框架内，反映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土地革命到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历程。

在“听命文学”的道路上，由于不同发令者具有各自的权威性，以及阶级斗争理论的扩大化和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出现了文学创作的“超政治化”和“极左化”的倾向，以致发展到文革时期把文学创作完全绑在了政治斗争的战车上，“听命文学”逐渐演变成必须统一听命于

① 蒙万夫：《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05月第1版，第95页，第81页，第95页

② 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摘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赵树理专集》，复旦大学中文系《树理研究资料编辑组》，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06月第1版，第141—142页



“三突出”的革命文艺理论的“将令”。这种状态既窒息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又桎梏了作家自由创作的空间。具有悲剧意味的是一贯以“听命文学”为己任的赵树理，柳青和浩然，他们都在听命的道路上反被“听命”所累，并各自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在文革中赵树理的创作被认为没有听命于当时所谓革命文学的号令而遭到批判，最终惨死于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之后。而柳青也一度被审查和批判，使他对《创业史》的修改和撰写也不断陷入困境。然而，浩然因写出了《艳阳天》，小说人物生动，语言大众化，更主要的是作品紧跟政治形势，直接反映了中国农村当时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被认为是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好作品，得到当时的认可，在文革中暂时安然无恙。但文革被否定后，他却被称为文革时期中国只剩下的“一个作家和八个样板戏”中的那个作家。浩然曾感慨地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的人身受到清查，作品受到批判，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被取消代表资格。开头，我的思想认识转不过弯子，愤慨、抵触、委屈、不服气。这当然全部无济于事，不可能扭转局势而改变我的困境，所以我又陷入悲观、迷惘的苦闷之中。^①

对此浩然深感无奈，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回避或摆脱党的方针政策和正发展着的各种运动对我创作的影响力；正好相反，作为一个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作家，总希冀配合得更紧密些、完好些。这样的观点和作法，使得我沾了光，也背了黑锅。”^② 浩然的这段话也可以或多或少地被看作反映了赵树理和柳青在那个时代的感受和心路历程。

结语

通过对“遵命文学”和“听命文学”的比较分析，我们看到在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中，农民题材的小说由于“遵命文学”和“听命文学”所处的不同时代和政治背景，使鲁迅、赵树理、柳青和浩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深深印上了当时思想文化和革命政治的烙印。

在“遵命文学”中，鲁迅是在文学的精神文化世界里独自地遨游，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十分强调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而不是把文学艺术当作听命的工具并与政治宣传同等起来。鲁迅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③

在“听命文学”中，赵树理、柳青和浩然是在文学的政治文化领域里搏击，更多的是对政治路线的服从，听其不疑，遵其不违。尽管这两种文学各具特点，但读者从他们的乡土文学中不仅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多种类型的农民形象，也能从中领略到他们的作品所反映出的两种不同的文学理念，在“遵命”与“听命”，主动与被动，独立与服从，自由与束缚的文学创作中，所折射出的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文化生态，政治斗争和文学思想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复杂关系和影响作用。

① 孙达佑 梁春水编 《浩然研究专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200页，第191页

② 孙达佑 梁春水编 《浩然研究专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200页，第191页

③ 鲁迅：《三闲集·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 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第84页



参考文献

- 鲁迅.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M]. //鲁迅选集:第5卷.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23-24
- 鲁迅. 呐喊·自序[M]. //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4-6
- 鲁迅. 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M]. //鲁迅全集: 第3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418
- 山西大学合编. 赵树理文集（1-4卷）[M]. 北京：工人出版社. 1980: 1827
- 董大中. 赵树理写作生涯[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153, 172
- 蒙万夫. 柳青写作生涯[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 81, 95
- 孙达佑 梁春水编. 浩然研究专集[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18
- 浩然. 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M]. 北京：华艺出版社. 2000: 277
- 赵树理. 《三里湾》写作前后[N]. 文艺报, 1955, (13), (24)
- 孙达佑. 梁春水编. 浩然研究专集[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26, 24
- 赵树理. 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D]. 赵树理研究资料编辑组.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C]. 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福建人民出版社:141—142
- 孙达佑, 梁春水编. 浩然研究专集[C].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191, 200
- 鲁迅. 三闲集·文艺与革命[M]. // 鲁迅全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84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Zhao Ping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Ph. D.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ddress (地址) :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18/18 Bangna-Trad Road. K. m. 18 Bangplee District, Samut Prakan, Thailand